

中國現代文學史

平
定
回
疆
方
略

中国现代文学史

(试用教材)

上 册

二十三省教育学院协编

前　　言

本教材主要是为了满足越来越多的中文专科毕业考入本科的学员进一步学习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急切需要而编写的。中文专科的教学可以选用，各类业余大学的教学和相当学历的自学者也可作为教材。

本书的编写，以文学运动和文艺论争开头，然后分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四大主要文体分别进行评介，各种文体都首先概述其文体发展的情况，然后按历史发展顺序，重点评介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努力展示各文体的发展脉络及其内在规律。在编写中注意吸取前人和近期的科研成果，力求内容丰富翔实。

二十三省教育学院的部分现代文学教师参加了这套教材的编写工作。在历时一年时间的编写中，得到了教育部师范司、社会科学院文研所负责同志的关怀指导，得到福建教育出版社有关同志的热情鼓舞，浙江、天津、北京、辽宁等教育学院的领导同志对本书的编印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使这套教材才得以预期问世。

限于编写者的水平，加之时间匆促，书中纰漏之处一定不少，诚望过目者提出修改意见。

编　者
一九八四年七月

目 录

第一章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概述

第一节	近代文学改良运动与辛亥革命前的资产阶级文学	(2)
第二节	“五四”文学革命的发展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运动	(8)
第三节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运动	(19)
第四节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文学运动的发展	(36)

第二章 中国现代小说

第一节	中国现代小说发展概述	(52)	
第二节	鲁迅的小说	(81) 一、鲁迅的生平和思想发展道路	(81)
	二、《呐喊》和《彷徨》	(97)	
	三、《狂人日记》、《阿Q正传》、《伤逝》	(117)	
	四、《故事新编》	(136)	
第三节	叶绍钧、王统照、许地山的小说	(146)	
第四节	郁达夫、张资平、冯沅君的小说	(171)	
第五节	茅盾的小说	(188) 一、茅盾的生平和创作道路	(188)
	二、长篇小说《子夜》	(202)	
	三、短篇小说《春蚕》	(220)	

第六节	巴金的小说	(228)
一、	巴金的生平和创作道路	(228)
二、	长篇小说《家》	(242)
第七节	老舍的小说	(254)
一、	老舍的生平和小说创作	(254)
二、	长篇小说《骆驼祥子》	(259)
第八节	蒋光慈、柔石、胡也频、叶紫的小说	(268)
第九节	肖军、肖红的小说	(301)
第十节	李劫人、张天翼的小说	(318)
第十一节	沈从文、张恨水的小说	(341)
第十二节	沙汀、艾芜、路翎的小说	(360)
第十三节	赵树理、孙犁的小说	(383)
第十四节	丁玲、周立波的小说	(404)
第十五节	钱钟书、黄谷柳的小说	(428)
第十六节	现代少数民族作家的短篇小说	(442)

第三章 现代戏剧和电影文学

第一节	中国现代戏剧发展概述	(449)
第二节	丁西林、欧阳予倩、洪深的戏剧	(469)
第三节	田汉的戏剧	(479)
第四节	曹禺和他的戏剧	(496)
第五节	郭沫若、阳翰笙等人的历史剧	(518)
第六节	夏衍、陈白尘的戏剧	(538)
第七节	《白毛女》等解放区戏剧	(559)
第八节	我国现代的电影文学	(572)

第一章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概述

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是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更加深入，出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转折过程中萌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现代新文学的产生一开始就以崭新的姿态反映了中国人民对政治、思想、文化的现代化的强烈改革愿望，体现了文学要与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的时代要求，和把文学作为改造社会的有力工具的热忱企望，从高举要民主、要科学的战斗旗帜而走向为人民、为革命的广阔道路。三十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在发展中，成分是复杂多样的，但以马列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学始终是居于主导地位，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体和主流。

从文学发展本身来看，中国现代文学的出现既是历史地结束了我国旧文学的停滞落后状态，逐步跃入现代世界文学之列的重大转变，又是对古典文学，特别是近代进步文学的继承与发展；既植根于中国现实文化的沃土之中，又接受了西方进步文学的深厚影响。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国人民进行思想、文化领域解放运动的历史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是在争取中国文学步入现代化的世界文学之林的进程中成熟起来的，是在继承中国优秀文学传统，坚持民族化、大众化的道路上探索前进的。它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翼，在斗争中承担了革命的历史任务，推动了中国文学的历史发展。

为了了解现代文学的产生和它历史的继承，我们首先应回顾一下近代文学发展的概貌。

第一节 近代文学改良运动与辛亥革命前的资产阶级文学

一八四〇年，中国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惨遭失败，帝国主义的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震动了昏庸、腐朽的封建大清帝国。在近代历史的发展中，中国日益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封建落后的中国王朝，无力抵挡帝国主义的入侵；帝国主义的入侵又暴露和加速了中国封建统治的腐朽、动摇。在皇帝和洋人的双重压迫下，中国人民更加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激起了接连不断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人民之中的有识之士在探求救国之道的过程中，面向世界，吸取了西方先进的文化和社会思想。这两方面在斗争中的逐步结合，终于促成了近代中国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萌生和发展。

从社会思想与文化思想上来看，由对“坚甲利兵”、“富国强民”的探求上，引起了“西学渐东”。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更激起了中国地主阶级中的开明知识分子和早期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化思想的追求。地主阶级自救图强的“洋务运动”，虽然由于其自身的腐败而破灭，但却带来了必然的影响，戊戌变法的改良维新，虽然由于其自身的软弱而流产，但却给闭塞落后的中国引入了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想和文化成就。社会思想的解冻，也促进了文化思想、文学观念的更新，伴随着近代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觉醒和发展，也出现了文学上的改良运动和辛亥革命前的

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文学运动。

早在鸦片战争以后，在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就出现了以反帝忧国为内容的文学作品，如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有的用诗歌揭示了当时“万马齐喑”的苦闷时代，喊出了“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解放要求；有的写出“中原果得销金革，两叟何妨老戎边”的忧国壮志。在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不仅产生了富有革命内容的作品，而且提出了“文以纪实”，“文贵从心”，“毋庸半字虚浮”，“不须古典之言”的文学改革主张。但这些作品和主张还未能形成明显的文学潮流，也没有体现出现代的文学思想。

真正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文学运动，还是在十九世纪末叶，以戊戌变法为标志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兴起后，才出现的。

首先是以反对清末文坛上复古主义、形式主义的“宋诗运动”而倡导的“诗界革命”。当时以谭嗣同、梁启超、夏曾佑等人为代表，提倡“新学诗”，主张诗歌内容应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新学”，引用西洋史、地和政治材料入诗，引用新典故。这虽有一些新的探索，但所用诗体仍是旧体，实质上的改革并不大，其中较有成就的应推黄遵宪，以《人境庐诗草》为代表。他主张“我手写我口”，力求摆脱旧诗格律的束缚，试用白话口语写诗，且诗中能熔铸新理，引用新知识，在旧体诗向白话诗过渡间是起了重要的探试和先导作用的。他的诗作《悲平壤》、《哀旅顺》、《哭威海》、《台湾行》等，反映了对甲午之战丧师辱国的悲愤，近似民歌体的《山歌》则可看出他运用白话写诗的工力。

在散文方面，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从宣传变法维新的需要出发，针对清末桐城派古文讲求“义法”，束缚思想的弊端，提

出了散文解放的主张。主张言文合一，语言通俗，“平易畅达”，“纵笔所至不检束，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五）甚至主张文中不妨“时杂以偶语韵语及国外语法”。并创造了俗语文体的“新文体”，用来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介绍东、西方新文化、新思想，在当时确实起了不小的作用。可是这种文体还是用文言文来写的，不过是近似白话，夹有俗语的通俗文言文而已，但对从文言文向白话文过渡的变革中，还是具有重要作用的，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体的解放。在他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文章，和后来结集为《饮冰室全集》中的很多散文，都体现了这种文体的特色。

在这场文学改良运动中，取得成就最大的应算是“小说界革命”。

在中国旧的文学观念中，小说一向是被认为“君子弗道”，不被列为文学正宗的。由于清末西方文化思想的传入和社会改革在宣传上的需要，使小说在人们的文学观念中有了新的改变。而梁启超、康有为等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更强调了小说的教化和宣传作用。梁启超则更把小说当成了改良社会的主要工具，他说：“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甚至强调世界各国“政界之日进”应以政治小说的功劳为最大。他还创办了《新小说》杂志，亲自写了《新中国未来记》等作品。由于这些人的倡导，特别是与东、西方交往的增多，大批留学生对外国文学的评价，更促成了文学观念的更新，推动了小说创作的兴盛。一方面是大量翻译小说的出现，一方面又出现了许多以暴露世态为主的白话小说。当时晚清小说出版多达一千五百余种，“政治小说”、“社会小说”、“科学小说”等名目

应运而生。在小说翻译中以林纾的影响为大，他用文言译述，且多迎合中国人的心灵习俗，颇受欢迎。他的译述多为英、法、美、俄的作品，共一百八十三种。另外梁启超、李伯元、吴趼人等用演述故事的译法，采用白话章回小说形式，更易为市民阶层接受，扩大了外国小说的影响，也促进了晚清白话小说的发展。白话小说的创作，在外国小说传入的影响下，借鉴了新的手法，内容也超出家庭和个人悲欢，转向对社会生活的关注。如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等等。虽然艺术成就一般都不高，但为后来现代白话小说的发展作了可喜的试探。

总观以上的概貌，可以看出近代文学改良运动的产生，一是适应了时代和社会的要求，二是在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出现的，面向世界文学吸入了第一股新鲜空气，开始接受了新的文学观念，提出了文体的解放，出现了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的趋向。文学内容也开始转向了现实社会和人生，第一次冲击了传统封建文学的霸主地位，为现代文学的形成发展开拓了途径。但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这种改良不可能彻底冲毁封建主义思想和旧文学的传统地位。这一运动也自然地随着改良运动在政治上的失败而衰颓下去。

在变法维新改良运动开展的同时，作为当时社会改革激进力量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坚定地以革命的手段进行推翻封建政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英勇斗争。他们从宣传革命，批判和否定封建统治的需要出发，也积极利用文学作为社会斗争的工具，形成一股有影响的战斗力量。

在文章方面，孙中山、章太炎、秋瑾、邹容等人的政论文都是气势夺人，慷慨激奋，各具特色的。如章太炎用白话写的

《革命歌》、《逐满歌》等，通俗流畅，鼓动性强。邹容的《革命军》感情激越，思想丰富，吹响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号角。

在诗歌方面，以柳亚子等人倡组的“南社”，集中了三四百人，虽然大多还写的是旧体诗，但内容中多充满了反帝反封建，重振中华的激情壮志，给旧体诗的创作，充入了新鲜的血液。陈天华在他短暂一生中写出了《猛回头》、《狮子吼》、《警世钟》等多部鼓吹革命的作品。秋瑾用散文、诗歌、弹词、小说等多种形式，从妇女的角度，揭露了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的罪恶，宣传了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民主、人权的思想，如《苦同胞》、《精卫石》、《某宫人传》等。马君武、苏曼殊等人翻译了歌德、雪莱、拜伦的诗歌，用异国的号角来鼓动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

这些文学成就，在进行反清和革命宣传方面，都起了积极作用，在文学创作中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倾向，对“五四”后的现代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但是，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文学改良运动，或是辛亥革命前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文学活动，都由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形势和中国社会性质所决定的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性，使他们在文学上也和政治上一样，不可能有革命性的突破，不可能承担起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在文化领域和文学领域中也不可能担负起创造适应时代要求，顺应世界发展的新的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使命。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因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无力与世界已经进到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与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新民主主义论》）。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的文学也正是如此，随着辛亥革命的失败，

便出现了衰落的趋势，封建势力的反扑，政治上的反动，也出现了文化逆流的泛滥，资产阶级再也无法独力组织反击，更谈不上进行文化上的革新和文学上的革命了。在文化领域里扫荡妖氛，在文学上进行革命和开创走向当代世界的中国现代文学的任务，只能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文化统一战线的战斗者的身上。在“五四”运动——中国现代社会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变革中，无产阶级带领其他革命阶级勇敢地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

(本节执笔人 杨世才、沙作洪)

第二节 “五四”文学革命的发展与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运动

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但没能触动封建制度的社会基础，由于他们自身的软弱性，也没有掀起一场真正的社会大变动。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阶级依然窃踞着政权，旧文化、旧思想仍然顽固地维护着旧的制度，压抑着人民的民族、民主意识的觉醒，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帝国主义无暇东顾，中国资产阶级力量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无产阶级也以崭新的面貌登上历史舞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大大鼓励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各种各样的西方新思潮的涌入又给人们提供了思想武器，面对革命的失败和历史的反复，当时激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特别是其中有志救国的知识分子们，深切感到：政权的革命代替不了社会的改革，必须要发动一场唤起民众的思想解放运动，才能进行深广的社会改革。顺应时代的潮流、历史的呼唤，“五四”运动冲开了旧中国阴霾的夜气，以风雷闪电之势，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斗序幕。标志着这场历史搏战的开端，就是发难于“五四”前夕的新文化革命运动。

一九一五年九月创刊的《新青年》杂志是这场新文化运动的最初阵地，以陈独秀为主编聚集了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致力于新思潮的启蒙宣传，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集中火力冲击封建专制主义和旧的伦理道德与封建主义制造的愚昧落后。当时以“西方的自由、民主、‘个性解

放”、社会进化论等思想武器向封建主义的思想核心——儒家学说，展开猛烈的进攻，“打倒孔家店”的浪潮如疾风掣电震动了黑暗苦闷的中国。封建主义的旧文学作为维护和宣扬旧制度、旧思想、旧道德的工具，自然成为这场进攻的突破口。于是以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为两大口号的文学革命就相应地爆发了。

“文学革命”正式提出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正式举起文学革命的大旗。他提出了要推倒“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建设“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的三大主义，痛斥了封建主义的“文以载道”、“代圣贤立言”的复古言论，提出要革新政治，必须要革新为旧政治代言的旧文学，要求以文学革命达到革新政治的目的。在此之前，一九一六年八月，李大钊在《晨钟报》上也发出要掀起一个新文艺运动的呐喊，指出“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只有发起“觉醒之绝叫”，才能惊破众人之沉梦。胡适在一九一七年一月于《新青年》上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系统地提出了改革的主张。他认为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也可说是切中了旧文学形式主义的弊病。他并认为：“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须有“高远之思想”、“真挚之情感”，且要求以白话文来取代文言文。这些主张对后来掀起白话文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没有接触到文学内容的革命。

文学革命的口号提出后，在思想界文学界得到不少人的响应，在文学改革的讨论中，钱玄同、刘半农等人也都发表了独

具见解的文章。

但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新青年》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就其领导者和宣传者来看还都属于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性质还未超出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战线上的继续，但斗争的坚决性和给予封建思想体系的打击是辛亥革命前所未有的，对人们的民族、民主意识的觉醒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但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中国无产阶级力量的兴起和一些先进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把这场革命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一九一八年初，十月革命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给中国革命带来新的希望，出现了新的因素。那些已经同封建主义决裂，又对资本主义前途失望的激进的爱国知识分子，从十月革命中看到了希望，找到了新的思想武器。在《新青年》阵营中具有激进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都先后接受了并热情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到“五四”前夕，已经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新青年》在战斗中也扩大了自己的队伍，这时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胡适、沈尹默、高一涵等人都参加编辑部，形成了包括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文学革命统一战线。

随着力量的壮大、战斗的进展，新文学运动向着纵深发展，在理论上、创作方法上和创作实践上都作出了战斗的实绩。在如何建设新文学的探讨中，大家对新文学的实质进行了有益讨论和观点的抒发。李大钊于一九一九年在《什么是新文学》中提出：新文学应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作者心理中”既要清除封建主义，也要清除资本主

义，要用“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作为“土壤根基”，试图从唯物史观来认识文学的实质和现象。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主张“用人文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要排斥、反对“非人的文学”，在《平民的文学》一文中，又提出了“为人生的文学”口号，后来为文学研究会诸作家所采用。胡适也发表了《易卜生主义》，要求作家要“说老实话”，要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真实现状，要敢于揭出社会的腐败龌龊的现实。傅斯年写了《白话与文学心理的改革》，进一步提出文学内容的革命要求。这些论点虽大多是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思想为核心，但都是适应了反封建主义的需要而提出的，是体现着当时民主主义革命要求的，比之于发动的初期是前进得多了。与此同时还对新诗歌、新小说、新戏剧的创作进行了理论上的研讨。先后发表的文章有胡适的《谈新诗》、俞平伯的《白话诗三大条件》、康白情的《新诗的我见》，胡适的《论短篇小说》、刘半农的《诗与小说精神上的革新》等，对当时新文学创作起了积极的影响。

在创作实践上更展现了文学革命的成绩，鲁迅的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作为现代文学的第一块基石，发出了第一声战斗的呐喊，深刻地揭出封建社会数千年的痼疾，思想上忧愤深广，形式也新颖动人，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显示了现代小说的特征和压倒封建文学的新生成威力。以后又相继写出《孔乙己》、《药》等，表现了彻底地毫不妥协地反封建的战斗精神。郭沫若的新诗《女神》和《凤凰涅槃》成为开一代诗风的奠基之作，强烈地反映了“五四”的革命精神。胡适的新诗《尝试集》、刘半农的《相隔一重纸》、叶绍钧的小说《一生》、刘大白、沈尹默的白话新诗，特别是鲁迅的杂文和李